

SU WENXUE

俄 苏 文 学

13

山东大学外文系俄苏文学研究室

目 录

评 论	西蒙诺夫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李之基 (1) 双子星座——陀思妥耶夫斯基和 托尔斯泰……周振美 (10)
文艺理论及 文学史资料	批判现实主义 (续)……C·彼得罗夫 胡扬译 (24) 美学……关引光译 (35) 表现出人民的英雄主义 ……K·西蒙诺夫 李之基译 (44)
中小篇说	松鼠……H·阿巴扎杰 沈灿星译 (60)
短 篇 小 说 及 其 他	尼林短篇小说两篇……王继思译 (95) 可爱的姑娘 最后一次盗窃 西蒙诺夫短篇小说两篇……周如心译 (231) 六月至十二月 第八次负伤 我受不了啊……B·拉斯普京 周振美译 (258) 婚礼……C·卡文科莉娜 张爱民译 (270) 现代童话四则……E·别尔米亚科 柱石译 (277) 七百七十七个工匠 第六顶头皮帽子 七个国王和一个女王 短篇故事二则……A·雅可文科 李一新译 (296) 和解 看望父亲

西蒙诺夫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李之基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原名吉里尔）1915年生于彼得格勒，他的童年是在梁赞和萨拉托夫度过的。他当时的同学E·卡尔别尔采娃回忆说：“我和吉里尔·米哈依洛维奇·西蒙诺夫同岁，我们曾在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学习，共同的童年回忆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她记得，吉里尔的家同她家住在城市的同一部分，但在不同的街上，吉里尔一家住在花园街，他在长诗《父亲》中提到过。她感到遗憾的是，吉里尔住在哪一座房子里她不记得了，但她记得她和吉里尔一起跟一位老年女教师学音乐的房子，她还记得他们一起上学的学校，这所学校在革命街上，现在叫第二中学，二十年代曾被命名为“实验示范”学校，后来叫克鲁普斯卡娅学校。

一位曾与吉里尔的母亲共事的老年护士玛丽娅·彼得罗夫娜·列夫琴柯，从吉里尔很小时就熟悉他，她不仅可以提供吉里尔一家在梁赞住过的好几个地址，而且回忆了吉里尔童年的一段往事。“吉里尔小时候，母亲在军事委员会当办事员，常带他去上班，在办公桌子后面用椅子给他安排一个床位。孩子很依恋母亲，很和气，有礼貌，大家都喜欢他。可是，一个领导发现了他，进行了严厉申斥，亚历山德拉·列昂尼多夫娜不得不快找保姆。”

西蒙诺夫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列昂尼多夫娜是位有文化

的职业妇女，为人正直，性格坚强，对丈夫和儿子关怀备至，是个知书达理的人。西蒙诺夫在谈他的家庭时写道：“我母亲出身在一个俄国贵族家庭，确切点说，是一个官僚家庭，但这个贵族不是地主贵族，而是象我们所说的，是‘官宦’贵族，我的外祖父是国家职员，母亲虽然也读完了特权学校——贵族女子学院，但还在革命前她就成了教育工作者，是外语教师。”“母亲在国内战争和战后时期曾在各种苏维埃机关里担任过各种不高的职务，这样的职务需要有文化、认真诚实的人担任。她自如地掌握了法语和德语，但这是在很晚以后才得到机会的，是在莫斯科，在她工作的最后一些年里，在当时刚刚建起的外国文学图书馆。”西蒙诺夫的父母对宗教的态度很能说明他们的为人。西蒙诺夫回忆说：

“严格说来，我们家从来不是宗教家庭，但在我童年时，我母亲和继父都信上帝，并且常去教堂，我十一、二岁以前，也带我去。后来对上帝的信仰不知怎么就自动从我们家消失了，对继父来说完全是不知不觉的，对母亲来说还有个补充的促进。有一次她在教堂赶上一次布道，她觉得是反苏的，她认为，从神甫方面来说是不诚实的，按她的观点，神甫不应该搞政治。我记得当时她就此事同我的谈话，但不管怎么说，这只是最后的一个促进，因为那时对她来说，信上帝已不是迫切的要求了。”评论家П·芬克在《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一书中也谈到了西蒙诺夫的母亲及他们母子的关系。“关于自己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列昂尼多夫娜，西蒙诺夫写得很少，只有淡淡几笔，写这位头发早白的妇女不畏艰难的生活，写她对丈夫和儿子关怀备至的温情。我同А·П·伊万尼舍娃·西蒙诺娃见过面，那时尽管她已年老，但她的精力仍特别出众。她背诵普希金、莱蒙托夫、丘特切夫的作品，

她很熟悉儿子的诗。我很容易想象出，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在童年不仅获得了士兵善心的直观课，而且获得了无限忠于俄国文学的直观课。当军事题材进入他的诗歌时，这个题材不能不作为最亲近的、内心必须的自己的题材而被领悟到。”母亲对西蒙诺夫的影响不仅有人处世方面的，而且有文学艺术方面，使他从小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对于生父，西蒙诺夫似乎从未提起，而他对继父的感情倒是非常深厚真挚，象他自己说的，“我在内心里爱他并不亚于爱我的母亲”。从四岁起他就习惯于将继父当成自己的父亲。西蒙诺夫的继父亚历山大·格利戈里耶维奇·伊万尼舍夫是个职业军官，出身于贫寒家庭，兄弟姐妹都受教育不多，只有他因偶然机会，在实业中学毕业后进了士官学校，因为作战勇敢，革命前已是上校军官。国内战争时期他和很多军官一起转向红军，继续在红军中服役；他在战争中多次负伤，实际上是个半残废人，所以到军事学校担任战术教官，一直干到三十年代。

西蒙诺夫的父母都为人正直，忠厚勤恳，性格坚强。西蒙诺夫从他们口中从没听到过对旧制度覆灭产生的怨言，他们认为俄国发生革命是公平合理的，他们对祖国的忠贞是不可动摇的。“俄国革命后，母亲的熟人和亲戚都有侨居国外的。她对待这种侨居有些忧郁，不理解。现在我想，大概这是比指责更深沉，更强烈的感情，她简直不可理解，怎么能逃到俄国以外去呢。”在他们看来，俄国知识分子的天职是为革命的人民服务，这是理所当然的，对这一点，直到他们生命的终结，也没改变过。虽然他们是非党人士，他们本人从没想过加入共产党，但是，当西蒙诺夫在卫国战争初期入党时，他们对此表示理解和赞许，对他从事的工作他们给予

大力支持。这些对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西蒙诺夫无疑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生活环境对幼年的西蒙诺夫的成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对他成年后的志趣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西蒙诺夫在自传中说：“我们家住在指挥员宿舍。军事生活包围着我，邻居都是军人，军事学校里的生活也都是我亲眼看着度过的。窗户外面的练兵场上经常进行早晚点名。母亲和其他军官妻子一起参加各种促进委员会，来找父母亲的客人最常谈的是关于职务和军队的情况。我每月两次和其他孩子一起到饮食供应处去领取供给指挥员的食品。

每晚继父都坐在那里准备次日上课用的教材，有时我给他帮忙。我们家纪律很严，纯粹是军事化的，有一个固定的日程表，一切都按准确的钟点进行，不许迟到，不让反驳，无论对谁下的保证，都要求遵守，一切谎言，甚至连最小的，都受到蔑视。

因为父母都是公职人员，所以家里有劳动分工。从六、七岁起，我就承担了力所能及的责任，以后又逐渐增加。我打扫灰尘，刷地，帮助洗餐具，削土豆，看煤油炉子，如果母亲忙不过来，还常去买面包和牛奶。我不记得有为我收拾床铺或者帮助我穿衣服的时候。”

这样的居住环境和家庭生活情况，以及父母的言传身教，对西蒙诺夫诚实严谨性格的养成和勤勉准确习惯的锻炼都是极为重要的。甚至他对军队的感情，也是从儿时就开始培养的。他说：“我们家的气氛和父亲服役部队的气氛，使我产生了对军队，对军队方面一切东西的眷恋，这种眷恋和尊敬结合在一起。这种孩提时代还不完全有意识的感情，象后来验明的，都成了根深蒂固的东西。”西蒙诺夫幼年时期

在梁赞的同班同学 E·卡尔别尔采娃回忆说：“我不记得他那时写不写诗，可是他的画倒是装饰学校所有的展览。他画得非常好，而且画得最多的是军事题材，骑马的红军，伏龙芝画像。……”童年时代的生活环境和家庭教育往往对人的生活道路产生巨大影响，西蒙诺夫的童年和家庭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西蒙诺夫成为一个专写军事题材作品的著名作家，谁能说他的童年生活和家庭影响不是重要因素呢？

西蒙诺夫小时候学习不错，喜欢读书，喜欢作文和绘画。卡尔别尔采娃写道：“吉里尔学习不错，但也不能说比别人强。……应该说明，四年级时我们常写命题作文，好的作文在课堂上念，吉里尔的作文常常得到这种荣誉。我还记得文学老师的话，他讲到我和吉里尔时说：‘看，他们在班上年纪最小，可是写得最好，读书最多’。”谈到读书，卡尔别尔采娃还回忆起一个故事：吉里尔和她同时跟一位老年女教师学过音乐，但他们对音乐并没表现出多么浓厚的兴趣，觉得音乐枯燥无味。后来有一个时期，他们突然积极起来，在预定时间以前很久就赶去上音乐课，女教师还在忙别的事情，就让他们到书房去等，这下一个宝库在他们面前打开了。女教师家书房里有大量藏书，从地板到天花板那么高的书架上，摆满了书。这时对他们来说是个幸福愉快的时刻，他们到书架上去找书，如饥似渴地读上几页。“我记得，最下层放着一些1912年和其它年份的合订本《土地》杂志，这些杂志我基本上都读了，显然，吉里尔也读了。……”

除了读书和绘画以外，西蒙诺夫小时候还喜欢参加各种业余文娱活动，演戏就是其中之一。卡尔别尔采娃回忆说：“我们满怀喜悦地着手排戏……我们自己做服装、道具，家长热心地帮助我们，包括吉里尔的母亲。

我们演一出叫《奴隶起义》的戏，说的是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吉里尔演布朗（黑人英雄），他穿着自己的长裤，腰里挂着用硬纸糊的手枪，用煤黑乱画上胡子，我们觉得真出色啊！……我演布朗的未婚妻，‘未婚妻’这个词叫人觉得不好意思，但艺术要求作出牺牲。”

西蒙诺夫小时候有着一般男孩子的共同特点，粗枝大叶，毛手毛脚，总往本子上弄墨水，两手也常弄上。但由于良好的家庭教育，他那幼小的心灵又容不得侮辱和无理。卡尔别尔采娃回忆说：“有一次在三年级，叶夫多吉娅·瓦西耶夫娜发作业本时，在大家面前抖动着吉里尔弄得非常脏的本子，开始申斥他太不整洁。后来她抓起本子就撕成两半，说这样的本子拿在手里都丢人。吉里尔从座位上跳起来，脸红得吓人，他一字一句地叫道：‘您为什么这样作？您没有权利撕本子！’我们简直全吓呆了，因为我们都怕这位严厉的女教师，她还让我们象古代那样站墙角呢。但十岁的吉里尔好象自尊心很强。他收拾起本子的破纸，说：‘我要向教育委员会申诉。’我班同学塔尼娅是教育委员会委员，她记得当时真的分析了这个事件，老师承认，她太急躁了。”这种独立和自尊的性格，对成年后的西蒙诺夫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西蒙诺夫的父母很注意培养孩子的独立工作能力，使其从小养成自主自立的能力，而且大人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榜样。他们家实行劳动分工，一切都按严格的纪律进行，孩子从小就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自己能干的事不推给别人，而且要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务活，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增加。

对西蒙诺夫自主精神的培养，最好的例子就是他中学毕业以后怎样对待选择道路的问题了。

1930年他们家住在萨拉托夫，当时西蒙诺夫读完了七年制中学，下一步该怎么办？当然可以工作，也可以继续上学，西蒙诺夫自己决定进工厂的艺徒学校去学车工。西蒙诺夫后来回忆说，促使他作出这一决定，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个，也是主要的，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行。当时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热潮和建设中所表现出来的豪迈精神深深地吸引了他，还在六年级时就把他征服了，他去工作，就是要与这一社会气氛相适应。第二个原因，是他想自立，渴望独立谋生。那时他们家并不宽裕，生活过得非常节俭，他想挣钱养家。一开始，这一决定并没得到父母的特别赞扬，家里进行过争论，后来母亲认为孩子已成年，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了，就没再介入争论。继父希望他继续上学，把他培养到大学毕业，以实现“他本人年轻时没能实现的幻想，”要在他母亲面前把他养大成人，真正尽到他作父亲的义务。争论没能改变西蒙诺夫的决定，“结果我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在这事上，不论是母亲，还是继父，都帮了我，他们俩都是性格坚强的人，教会了我反抗。”继父再也没表示反对，只是严峻地说：“既然决定了，就让他干吧，这是他的事！”

就这样，西蒙诺夫进了艺徒学校，先当车工助手，后当车工，先在萨拉托夫，后来随父母到了莫斯科，1932年从艺徒学校毕业，成了四级车工，曾在几个工厂工作，一共干了五年。这几年中，西蒙诺夫靠自己的劳动挣钱养活自己，也养了家，干活的第三年，他可以挣到和继父一样多的工资，受到了继父的尊重。同时，这几年的生活实践教给他很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他说：“我的手远不是一双巧手，学手艺遇到很大困难，不过情况逐渐变得顺利起来……”所以他把当工人的这几年称为“不错的生活学校”，对我来说，第

一所生活学校是在生产中工作的那几年。这几年成为我的生活学校，不是因为它们直接反映在我的书里，关于这些我一点儿也没写过，而是因为它们把我造就成为一个人。我在机床旁边干了五年，这些教会了我这样，而不是那样来看待某些东西，明显地使我严守纪律，使我受到很好的训练，能应付生活的复杂性，我重复一次，虽然这五年在我的书中没有直接反映。”

后来，这件事过去了，因为选择道路在他们父子之间产生的争论平息了，只过两年，他们有点儿疏远的关系就恢复了，这种疏远虽不长，但曾使西蒙诺夫非常难受。因为他向来都是把继父当成生父来尊重的，他象爱他的母亲那样爱他的继父。

西蒙诺夫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经历，对他后来成为卓有成就的以写战争见长的作家来说，起码有两点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一是家庭教育和生活环境的影响和熏陶，第二是青少年时期独立自主精神的培养。

家庭和环境给与西蒙诺夫的，首先是对军事生活的熟悉、向往和热爱，不能说这时的兴趣就必然决定他成年后从事工作的性质，但其作用又是不能否认的，西蒙诺夫在自传中一再强调这一点，恐怕也并非没有用意。其次是父母的为人对他的直接影响，严格的工作生活秩序和劳动习惯的培养。这些往往被看成生活小事，引不起人们的重视，从西蒙诺夫的经历可以看出，他严谨的工作态度，不怕艰辛的创作精神，正是从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中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

少年时代的西蒙诺夫，自主自立的要求十分强烈，为了毕业后走自己认定的道路，不惜同家庭进行争论，甚至同他非常尊敬的继父在感情上产生了隔阂，这说明他要求自立不

是头脑发热，不是感情冲动，也不是赶潮流，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一种高尚的追求，是青少年渴望用自己的劳动实现自己愿望的奋斗精神，这是十分可贵的。为人民服务的手段是各种各样的，成功的道路有千条万条，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才能真正使愿望变成现实。西蒙诺夫不继续上学而进工厂，同样取得成功的事实，雄辩地说明这一点。

以上两点就是在当前对我们也具有重要启示。一切渴望成才的青少年，可以从中体验到，成才的道路要靠自己脚踏实地地走，不得过高地看重机遇。一切望子成龙的父辈，可以从中体味到游泳要在大海中锻炼，雄鹰要在高空搏击这一道理，真正为后辈提供和创造有利于他们成长的条件。

双子星座——陀思妥耶夫斯基 和托尔斯泰

周振美

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坛，名家荟萃，著作辉煌。高尔基说：“没有一种西方文学象俄国文学这样有力而迅速地诞生，放射出这样强烈而耀眼的天才的光辉……没有一个国家象俄国这样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就出现了灿若群星的伟大名字”（《高尔基论文学》续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00页）。在这灿烂的群星之中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 光华四射的双子星座，星座上的两颗明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两位文学巨匠如同两面各放异彩而雄奇的山岗，形成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

我们之所以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比喻为双子星座上的两颗星，是因为尽管他们的社会经历和个人性格特点有很多不同，尽管他们的创作具有不少显著的差别，但同时他们的思想和创作之间又具有重要而深刻的有机的内在一致性，他们的创作是人类文化中有深远的同源关系、很相似的两种独特现象。对这两位伟大而复杂的作家作全面的比较非本人和本文所能及。我只想对他们的某些相似的一致性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创作名副其实地属于同一个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穷人》于1846

年发表。过了六年，1852年托尔斯泰的第一部中篇《童年》问世，而且他们两人的文学引荐人都是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最大部头的长篇小说都在60——70年代刊登在同一个杂志《俄国罗斯导报》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正是在托尔斯泰生活中的关键性转折时刻发表的(1880年)——他和贵族阶级的一切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转到了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从这时起托尔斯泰生活中的一个新时期开始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所处的时代正是俄国实行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的前后，是俄国从农奴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改革后，农奴制的残余仍然渗透在俄国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生活当中。这些残余犹如沉重的桎梏一样，束缚着人民群众。同时国内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形成了新的剥削人民群众的形式。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出身和个人经历极其不同，但是他们都仇恨俄国农奴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青年时代既受过果戈理人道主义的影响，也受过四十年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的影响。1849年，他因参加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反农奴制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并在小组中宣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那封著名的信，被沙皇当局囚禁，流放十年之久。托尔斯泰长期生活在乡间，“极其熟悉俄国的村乡，熟悉地主和农民的生活”（列宁《论文学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217页）。他目睹了农奴制的残酷，同农民有广泛的交往。“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急剧破坏，加强了他对周围事物的注意，加深了他对一切的兴趣，使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同上，217页）。他成为俄国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代言人，不断揭露农奴制的罪恶本质。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对资本主义也同样十分厌恶。托尔斯泰1857年和1860—61年的两次西欧之行，使他对起初还很欣赏的那种资本主义的“社会自由”完全失去了信心，他认清了资产阶级文明的丑恶本质。他于1857年写的短篇小说《琉森》以概括凝炼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初次西欧之行的观感。作家在一个短篇中描写的事实包含着极为广泛的概括意义，它就象一个小细胞一样成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缩影。它表现了一种事实：法律上的平等不但没有消除富有的英国人和仆从们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甚至连有固定收入的看门人和每时每刻都可能当作流浪者被逮捕和被关进监狱的流浪歌手之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也没有消除。

托尔斯泰初次走访西欧之后，过了五年，即1862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前往西欧各国。回国后，1863年写的《冬天记录的夏天印象》对西欧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文明作了深刻的批判。这部作品同托尔斯泰的《琉森》在体裁、情景的选择和艺术风格方面迥然不同，但是其中的结论和印象却相似得令人吃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写道：“……人们宣称自由、平等、博爱，这很好。什么样的自由呢？大家在法律范围内一律有权为所欲为的自由。什么时候能够为所欲为呢？当你有百万财富的时候。自由是否能给每个人百万财富呢？不能。什么是没有百万财富的人呢？没有百万财富的人，不能为所欲为，只能任人所为”（《冬天记录的夏天印象》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64页）。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确认了一种事实：在存在着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物质上和经济上的不平等的社会中不可能有任何现实的自由和平等。两位作家对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批判具有比较深刻的民主主义性质，客观上也是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俄国贵族资

产阶级土流社会的批判。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虽然都对农奴制和资本主义怀有敌意，但都没有象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那样，上升到革命民主主义的高度。面对俄国社会新旧更替的动荡时期，而对共同的社会情势，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在深沉思考。而由于各自的生活经历不同，托尔斯泰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宗法制农民身上，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把注意力转向了在农奴制和资本主义夹缝中生存的小市民。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对人民的认识 and 对待人民的态度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人民的精神道德胜过统治阶级。他们都崇敬人民的优秀品质，主张到人民中间去寻根，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正义感和对正义的热烈追求”是“俄罗斯人民最崇高和最显著的特点。”他热情而坚定不移地指出了隐藏在俄罗斯人民内心深处的巨大力量。他在《死屋手记》中写道：“我们的贤哲们并没有很多东西可以教给人民。恰恰相反，贤哲们自己应该向人民学习”；（《死屋手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95页）。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揭露了贵族的道德沦丧，知识分子的软弱。对这类阶级的失望使他把俄国社会的希望寄托于人民。关心人民的命运成了他创作力量的源泉，体察俄国人民的精神本质成了他研究的主要课题。他的作品，从发轫并成了成名之作的《穷人》开始，到最后一部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堪称小市民的画廊。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了小市民们的生活，反映了小市民们对农奴制的仇恨和对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恐怖与诅咒，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他特别歌颂那些虽然备受欺压，但仍然能够保持自己的坚强

性格的人。德国著名作家伯尔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种很高的评价，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自人民，与人民共存。从广义上说，人民是他唯一的‘材料来源’……正是因为陀思的耶夫斯基与时代、人民和国家紧紧相连，所以他是永恒的，这意味着：他永远是当代的”（伯尔《漫谈陀思妥耶夫斯基》）。

托尔斯泰跟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对普通人的命运、人民的命运十分关心。按照托尔斯泰的观点，农民对于受过教育的贵族来说不是“弟弟”，而是“哥哥”。他在《哥萨克》和六十年代的教育学论文中断言，不是贵族应当教导农民怎样生活，而是贵族应当向农民学习生活的方法。托尔斯泰曾说：“为了使作品成功，必须爱作品中的基本思想……在《战争与和平》中我爱人民的思想……”（塞·亚·托尔斯塔娅日记（1860——1891年），莫斯科，（1928年版，第37页）。托尔斯泰一生中都在“尽力写人民的历史”。从他的早期作品《一个地主的早晨》到最后部长篇小说《复活》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农民形象。作家以清醒的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人民的劳动，人民的苦难，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寄生生活，以及当时的社会制度的残暴和不公正。托尔斯泰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对整个国家机构和社会制度提出了控诉，表达了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社会取代警察式的阶级国家的宗法制农民的心理愿望。把“上层分子”的生活与普通人民的生活作对比是托尔斯泰的不少作品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人民的形象与老爷、贵族的形象的对比中，托尔斯泰深刻地揭示了普通人的道德优越以及他们心灵的伟大。

托尔斯泰歌颂人民力量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战争与和平》。他在这部作品中不仅以浓重的色彩描绘了俄罗

斯军队的英勇无畏，同时也以同样的色调勾画出了广大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抗击敌人的英雄群象。歌颂人民力量的主题，还包括了对某些贵族人物为人民的解放而追求，而探索真理，在人民的启发下走上了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道路的描写。他笔下的主人公彼埃尔·别祖霍夫和安德烈·保尔康斯基不仅有理想，更重要的是他们有行动，和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在人民的直接感召教育下，走上十二月党人道路的。

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托尔斯泰都把在俄国改革前夕，尤其在改革后一个时期，在艰难而矛盾的环境下发展人的个性和个人意识的问题放在自己艺术分析的中心。他们都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具有广阔视野，又有复杂的精神探求的人物身上。他们都选择在思想意识方面从陈腐传统的影响下解脱出来的人作为描写的主要对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房东》中的奥尔登诺夫，《罪与罚》中的拉思科尔尼科夫，《白痴》中的梅希金，《少年》中的阿尔卡季·多尔戈鲁基等；托尔斯泰的《哥萨克》中的奥列宁，《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和彼埃尔·别祖霍夫《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等，都是些具有复杂的内心世界和艰苦探索的人物。他们的作品都极力表明，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发展人的个性乃是极其复杂而艰难的事。他们两人尽管用不同的方式，但都描写出了，脱离人民的主人公的个人自我意识的加强必然导致内心的不协调。他们的作品都充满了对识多见广的人与人民协调一致的渴望。按照他们的观点，没有这种协调一致要摆脱社会矛盾是不可能的。他们都认为，为了使主人公的精神保持清醒，为了他们道德自我完善，重要的措施就是使他们以及那个时代全体